

## 向西向下: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

□ 尚季芳

1937年,七七事变爆发,在华北、华南地区的高校不得不走上万里西迁的征途,为中国的未来保存一线文化命脉。斯时,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设置于北京和天津的北平师范大学、北平大学、北平研究院、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北,组建西北联合大学,落脚于陕西汉中中城固县。因着抗战的爆发,西北成为重要的抗战大后方,成为支援抗战胜利和建设国家的重要根据地。国民政府出于开发西北、“奠定西北高等教育之基础起见”,经1938年和1939年的运作,最终将西北联大分别改组为西北大学、西北工学院、西北农学院、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五所高校。由于城固地盘狭小,“不足以应西北广大社会之需要,而谋学校本身之发展”,教育部重新布局各大学的永久校址,最终决定“西北大学迁设西安,西北工学院迁设宝鸡,西北农学院仍设武功,西北师范学院迁设兰州,西北医学院迁设平凉”,显然,这是国民政府重视开发西北的重要举措。

## 一、吾道西行,国立大学迁甘之第一个

北平师范大学在西北联大内,先后改建为教育学院和师范学院,1939年8月整体改制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,1940年奉命迁往兰州办学。起初,教育部命令甘肃学院的文史、教育两系并入西北师范学院,“并以其院址作为该院之院址……迁移事项,应于本年暑假内办理完竣”,飭令甘肃省教育厅尽快协助办理。听闻这一消息,甘肃各界极为振奋。1940年7月,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发电邀请,态度极为诚恳:“贵院历史悠久,成绩卓著,海内外蜚声,此间有奉令迁甘之议,将于西北整个文化推进贡献重大力量,本会代表全甘民众欢迎并愿切实赞助,盼早来临。”事实上,斯时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所处的陕南城固,虽然物产丰富,气候宜人,然其地理位置偏僻,交通不便,不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,迁移他处不失为明智之举。兰州当时为西北抗战后方的政治中心、交通中心、国防中心和文化中心,地位举足轻重,时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的李蒸先生对此深谋远虑,认为迁移兰州才能为学校发展带来新的生机。

1940年7月和1941年4月,李蒸率团两次前往兰州,洽谈迁校相关事宜。针对与甘肃学院合并之事,李蒸通过考察,1940年8月31日呈文教育部,指出:“兰州当西北要冲,回汉相处,如以教育为政治军事建设之前驱,则本院将永为西北最大的文化堡垒。精神国防前线之所寄托,本院不敢厚于自任、重于作始。且欲为永久基础,自亦有远大计划,若沿用甘肃学院旧址,则因陋就简,现在既有轰炸之虞,将来亦多尘嚣之扰,实不足以实现应有之使命。”李蒸委婉指出,从国家政治军事建设大计、从民族团结大局出发,西北师范学院承担重大使命,合并非长远之计。更令李蒸担忧的是甘肃学院乃一省立学校,实力匮乏,经济支绌,教学科研举步维艰,且学校大权掌控在地方人士之手,内部矛盾重重,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远道而来,人生地不熟,一旦合并势必影响师生的办学积极性,因此独立设校乃为上策。李蒸的上书得到了教育部的允许。

独立办学得到批准后,李蒸加紧新校址考察,他提出选择校址的四个条件:第一,学校不能设在城内,在目前是为了防止敌人的空袭,而长远是为了避免城市的商业气氛对学生的负面影响;第二,不能离城太远,也不能离城太近,最好是仿照北平清华大学、燕京大学的方式,离城十至二十里之间;第三,交通要方便,最低限度能通汽车和人力车;第四,必须见到黄河,一则风景问题,二则为吃水问题,万一用水发生恐慌,还可以到黄河去取水。最终确定兰州城西十里店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永久性地址。

1941年6月,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院筹备处在兰州成立,胡佑铭为筹备处主任。10月1日,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院正式成立,齐国梁任兰州分院主任。10月24日,梁荣庭等押运学校图书、文具22箱及师生行李40余件,开始了第一次迁移,他们所乘木炭车用了12天时间到达兰州,中途机车多次损毁,师生屡遭饿饭、寒冻和生病。如至江洛镇时已深夜,找到一家招待所,“熬得大米稀饭一桶,炒白菜一盘,十余人围站而食,比鱼肉还要好吃”。12月,兰州分院举行首届新生开学典礼,《大公报》发表如下消息:“该院此次奉命在此设立分院,为抗战以来国立大学迁甘之第一个。”从此,城固校区不再招收新生,待老生全部毕业后,城固校区使命结束。

以后历年搬迁陆续进行,1942年8月,李蒸携全家与部分教职员赴兰,卡车在天水时突然翻倒,车上人和行李全部被甩出去。李蒸先生的儿子李幼蒸后来回忆说:“在我四五岁时,全家随学校迁移至兰州十里店时乘坐的敞篷卡车途中翻了车,所幸未受重伤,后来我的嗅觉永远记住了那次卡车旅行中的汽油味道。多少年后,一闻到汽油味总会想到那次陕甘路上的初次嗅觉体验。我还模糊地记住了途中过夜的天水市。这个名字大概是我一生中除城固外记住的第二个地名。”搬迁过程中出现这种现象,并不少见,不过李蒸并不在意,他说:“我们搬家实在困难,实在勉强,但是我们决不灰心,我以为越是在困难的环境中发展起来,越有意思,假设别人一件件都做好了,让我们不劳而获,那是最落伍的表现!”1942年9月,兰州分院改为本院,城固校区改为分院,李蒸奔波于兰州与城固之间,指导两地办学。

历时四载,截至1944年暑假,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部搬迁至兰州,12月17日,学校举行建校42周年纪念,李蒸院长别有意味地提出了“收复失校”的使命,他说:“自二十九年(1940年)起,本院奉令迁兰,历时四载,艰苦备尝,但幸能于本年暑假完成迁校大计,奠定西北高等教育基础,粗具规模。此后自当秉承教育部意旨,负起培养西北各省市中等学校师资、促进文化建设的重大使命。”1944年年底,学院在校学生数1010人,教师159人(其中教授51人,副教授26人),职工66人。师院附中于1943年在兰州十里店设立分校,1945年全部迁到兰州。《西北学报》介绍西北师院:“上至研究所,下至小学幼儿园,无不具备……从它的历史以及目前的规模看来,实在是西北的一个庞大而完

尚季芳  
SHANG JIFANG

甘肃张家川人,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,毕业后留校任教。2007年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。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校史研究中心主任、西北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,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,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,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理事。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与社史。



西北师范大学

整的最高学府。”

从北平师范大学到西北师范学院,从燕山脚下到黄河之滨,中国优质高等师范教育向西推进了1000多公里,成为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第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院,亦是国内最大的师范学院,被时人誉之为“西北教育的拓荒者”“开发西北教育的急先锋”“西北师范教育的摇篮”。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对西北师范学院给予了更高的期望:“西北师范学院实为师大之衍,昔日师大之精神将因此而永远扩展于西北,在师大同仁必有吾道西行之感……所望执事领导同仁,继续努力,共图师范教育使命之完成,为民族复兴奠立精神之基础,则非徒为西北一隅。”揆诸后来史实,西北师范学院在抗战的艰难困苦中,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,促进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壮大,为战后中国师范教育布局提供了典范。1946年,国立西北师范学院300余名师生前往北京,组建西北师范学院,后发展成今日的北京师范大学;一部分师生继续留在师院,发展成今天的西北师范大学。两所姊妹学校,共同谱写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华丽篇章。

## 二、启迪心智:积极开展社会教育

近代以降,开发西北呼声渐高,至抗战时期达于极点。战时举凡粮食、兵役、合作社组织和道路修筑等都与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。然当时西北教育不普及,农民知识水平很低,文盲数量极大,严重制约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抗战建国大业的推进。辗转迁移到甘肃的西北师院,备受战火摧残和煎熬。作为甘肃地区唯一的国立高等学府,院长、民众教育专家李蒸深知政府在西北设立师范学院的用意,那就是培养师资、研究高深学问,同时协助西北教育当局发扬西北文化,普及教育于广大西北地区。他坚信,欲实现民族独立,取得抗战胜利,推行民众教育则是最佳途径,一旦民众教育普及后,“至少半数以上有政权,可作中国之主人,经营国事”。

在抗战的大形势及李蒸先生的热心推动下,西北师院的社会教育于1941年1月在城固和兰州拉开了帷幕。社会教育的内容有举办抗日宣传、政治动员、补习教育、合作训练、甲长训练、扫除文盲、卫生宣传、开设诊疗所、破除迷信、提倡新生活、开办游艺室、开设民众代笔处和设立妇女识字班等。

城固社教活动主要在留乡开展,截至1941年7月,历时半年,成绩突出。扫除文盲社教组共招收学生208人;保甲长训练组共培训甲长28人;合作训练组共培训合作社社员和职员255人;民众问事处共有200余人咨询兵役法规、合作组织办法、军粮粮派及国家时事;民众代表处给200余乡民写信、写呈文及对联;简易诊疗所共诊治秃疮、疥疮、普通破伤等250人;游艺室有500余青年学生、农民及合作社社员来打乒乓球、下象棋、奏各种乐器等;来阅览室借书者共计380余人;乡民体育场共有1000余人来打秋千。

在兰州,社会教育的地点选择在西北师院近旁的孔家崖和十里店。1943年共组织补习班性质的社教活动三种,其中儿童组共7班,250多人;妇女班2班,50多人;成人班100多人。1944年8月,举办儿童、中学、妇女和成人四种补习班,其中十里店共招收学员160人,孔家崖共招收学员250余人。在抗日宣传方面,如孔家崖社教工作队创办《民众周报》,展览国际图片,展览飞机大炮模型,灌输民众必需常识,

激发民族意识,阐扬国父遗教;并且摘录报纸上的重要新闻及地方重要消息开设民众阅览室,征集文字浅显、有实用与教育价值的图书100余册,让民众前往阅览,使民众明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知识,知道人民和国家的关系;同时邀请甘肃科学教育馆来十里店放映幻灯,介绍国家大势,观众有千余人,反响强烈。

该项工作颇费心力,在招收成人学生上最具困难。因补习教育的时间一般在7、8月份,恰为农忙时节,成人多不愿放弃农事来参加教育。鉴此,学生们尽量劝导,并赠给书籍和笔墨纸张,同时利用晚上搞一些娱乐活动,才吸引了部分学员。在开设课程上,也很有针对性。妇女班参差不齐,他们采用分组和个别教法,对不能来上课的妇女,到家庭教学,解决了好多困难。在儿童班,为了让升中学的小学生业生有充分的准备,办了一个升学辅导班,补习国语、算术和常识3门课程,解决了学生们好多问题。

深入基层的社教工作最终得到了受益民众的理解和支持。1942年7月暑假,城固留乡的社教工作到期后,民众纷纷要求延长10日,自愿捐助伙食津贴。当学生返校时,当地士绅设筵款待,民众依依不舍,燃放爆竹欢送,而且成人班的学生自愿将师院学生的行李送到学校。兰州十里店妇女班的学生为感谢师恩,“把自己菜园里的辣子茄子,赠给老师一篮,权作礼物,深情厚谊,着实令人感动”。社教工作的负责人王镜铭总结城固社教工作的成绩时说:“本区服务地点的文盲减少了三分之一,兵役动员显著有进步,合作社普遍成立,贫农普沾低利贷款实惠,乡民卫生保民会议定期召开,乡行政人员贪污不公现象渐行敛迹,一般乡民多这样说:‘从前开会我们都不敢说话,社教区来此后,我们都敢说话了。’”

西北师院举行的社会教育,对外影响很大,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褒扬。留乡社教工作,不仅激起了本院学生的社会服务高潮及参加社教的兴趣,而且附近各校学生对此也有浓厚的兴趣。“西北大学政治系学生,汉中师范、文治中学学生,曾由师长率领前来本区参观,对社会服务均有正确认识,陕南青年社会服务的风气,本区的影响实匪浅鲜”。迁入兰州后,西北师院的社教工作经常被媒体报道。1943年8月18日《甘肃民国日报》以《十里店社教工作成绩斐然》为题进行了报道:“青年会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合办之社教工作,四周以来,成绩斐然,已引起各界人士之注意,数日前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。”国民政府教育部也来电嘉奖西北师院举行的社会教育工作:“查该院发动师生作大规模之社教活动……均称切实,殊堪嘉许,嗣后仍努力服务社会,化民成俗,以宏社教效能。”社教工作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,使学生得到了实际工作的经验,使民众得到了一定的文化常识,更使他们逐渐萌发了合作民主、抗日必胜的爱国信念,促进了底层社会的现代化进程。

## 三、请缨报国:参与了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领导工作

随着日寇侵略的深入,国统区面积迅速缩小,兵源补充受到很大影响。同时,受“好男不当兵”的传统观念影响,知识分子参军者甚少,国民党的军队中工人、农民居多,知识水平较差。然而,当时的战争已经运用了许多高

科技手段,既有的军队很难胜任复杂的战争形势,造成军队的战斗力很低。在此情势下,招收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补充到军队中来,是国家于危亡之际的迫切选择。1942年10月,蒋介石通电全国,要求各级学校的兵役适龄学生,自1943年1月起,一律依法抽签,按序征召入伍,不得缓役。这一通电,标志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发轫。地处兰州的西北师院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,掀起了从军运动热潮。

相较免受战火蹂躏的其他学校,西北师院知识青年更能体会到国破家亡的痛楚。院长李蒸先生对这一运动持积极的支持态度,他说:“今后决定性之战争,须赖高度科学技术与最新式武器之运用,知识青年,已有科学基础,再施以短期的现代化军事训练,则杀敌效果,不成问题,切望中等以上学校身体强健的青年,均能奋发请缨。”此后,李蒸实际参与了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领导工作。1944年11月3日,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成立,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兼任主任委员,聘请李蒸等14人为委员。

在校内外情势的推动下,西北师院及附中学生踊跃登记从军,报国之心不减前方将士。截至1944年12月18日,从军学生达130余人。当日举行盛大欢送会,在校师生3000余人参加,首先由院长李蒸讲解成功、成仁真谛,教职员代表李建功、方永蒸致辞慰勉,学生代表吕作矩致欢迎词,从军代表王丕仁致答词,会场空气极其热烈。对于批准正式入伍的学生,每人赠给由学校女生亲手制作的校旗一面,希望其努力报国,师生还为从军青年捐款15万元。

在从军学生入营时,十里店各界又举行了欢送大会,各机关、各学校及附近民众6000余人参加,盛况空前。西北师院教授王镜铭致欢送词,李蒸等相继讲话,远征军代表李玲善致答词,“大会于十一时完成,此后欢送,高呼口号,情绪异常热烈,汽车过商店门口时,各商店爆竹齐鸣,商民夹道欢呼,欢送高潮,达于云霄。师院李院长、金教授谢荣、方校长、王主任镜铭同乘汽车,送该院学生入营”。

西北师院知识青年入营后,正式编组训练,然后送往天水、汉中集训,准备派往前线。由于抗战很快结束,青年军未能发挥大的作用,随后有些被编遣复员,有些卷入了内战的漩涡。

不管结果如何,西北师院知识青年从军和全国各地的从军青年一样,都为报效祖国,请缨杀敌,其个案实质上是大后方高校的一个缩影。国难当头,知识分子通过此种方式救国救民,实现其弘毅之责。就整个甘肃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言,按国民政府的预定,甘肃征集数额为1000~3000人,但后来争相报名者比比皆是,以致实际数额达到了9037人,远远超过了原有的配额,这种结果与师院所起的主导作用密切相关。

## 四、学术与地方的互动:努力开发西北的思想与实践

战时西北国防地位陡增,蒋介石训令要把西南建成抗战的根据地,把西北建成建国的根据地。西北更以其中华民族发祥地的地位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一剂良药。中央大员、社会贤达、新闻记者都将目光投向了这片热土,畅谈开发西北的重要性。作为师院院长的李蒸自是不能例外,他一再强调:“西北为中华民族发祥之地,亦为中国文化发源之地,该文化建设应从西北做起,盖因其有历史的与社会的良好的基础,略加人力即不难振复兴。”对师院来说,正适逢其时,应该做西北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,“虽深感能力绵薄,但以职责所在,亦必竭力而为之,唯愿各界人士鼎力进行,以期早日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”。

鉴于,李蒸对毕业生期望甚殷,希望他们在毕业后参加到西北建设的大业中来。他1943年在给毕业生的留言写道:“开发西北为抗战建国之第一急务,开发工作首赖教育,诸君毕业之后,当以西北为服务领域,下定决心,争先恐后,同在西北工作,以符政府分区设立师范学院之本意,一以奉行中央开发西北国策,切不可仍蹈故常,竟赴通都大邑,求交通之便利,图个人之安逸,而忘国家民族之大计。”当时,西北师院的毕业生大都服务于西北各省的教育行业,努力工作,辛勤耕耘,未辜负李蒸院长的一片期望。

人才是开发西北的关键。李蒸认为除了师院自己努力培养外,引进人才“为西北基本重要之图”。本此思路,李蒸为师院引进人才不遗余力,他以真情聘请了当时国内一批名流莅院,如教务主任兼国文系主任黎锦熙、训导主任兼体育系主任袁敦礼、英语系主任张舜霖、史地系主任任谦亚、公民教育系主任王凤岗、数学系主任赵进义、理化系主任刘拓、博物系主任郭毓彬、教育系主任李建功、家政系主任齐国梁,以及金润棠、马师儒、郝耀东、鲁世英、程克敏、谭成甫、王耀东、何士骥、许寿裳、杨慧修、高文源、方永蒸、胡国钰、唐得源、董守义、徐英超、叶意贤、黄国璋、包志立、罗章龙、陆德德、邹韵君、殷祖英、李镜湖、刘朴、刘亦珩、张德馨、傅种荪、张贻侗、朱有宣、汪荃仁、黄文弼、孙之淑、王非曼、杨永芳、杨立奎等知名教授。这些知名教授是学校的一笔宝贵财富,他们的到来,为学校发展增添了动力,同时为西北地区造就了大批有用之才,成为西北文化建设的中流砥柱。

西北师院还肩负着陕、甘、宁、青、新、豫和绥七省的现任教师进修、中等教育和小学教育改进等方面的任务。李蒸认为师资训练“为西北文化建设之根本”,西北师院先后成立了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、中等学校教育进修班和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等机构。1941年8月,在城固召开本区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,以后逐年举办暑期讲习班,又与地方当局合办暑期中等学校各科教员讲习讨论会。在中等教育的研究方面,先后成立了师范研究所、中等教育通讯研究处等机构,编写了部分教材,为西北中等教育助力甚多。

(未完待续)  
原文刊登于《人文甘肃》第六辑